
环境协同治理：整合结构、观念与行动

——基于“嘉兴模式”的案例分析

张力伟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 吉林长春 B0012)

【摘要】面对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威胁, 环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作为对传统管理工具的取代, 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模式不仅受到理论的观照与证明, 还得到了实践的验证与推广。环境治理的“嘉兴模式”, 作为多元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典型, 一方面以协同治理构建了环境治理的创新机制, 另一方面为各地的环境治理实践提供了借鉴。“嘉兴模式”在结构、观念与行动三个方面具有相当优势, 但是以“嘉兴模式”为基础探索更为系统的环境治理体系应是其未来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环境治理; 协同治理; “嘉兴模式”; 环境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18)02-0045-08

当前, 随着国家现代化治理的不断深入, 作为其子集的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在变动的社会发展中进行调适与重构。肆虐于大江南北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现状, 在自然因素的背后必然隐藏着人的作用。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这对传统矛盾中, 环境破坏对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影响与日益激烈的环境冲突不仅关涉生态系统的继续, 还影响着政治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稳定。在此背景下, 以政府为主导的新型环境治理模式以系统化的视角与多元化的手段回应生态破坏与日益增长的环境利益诉求对国家与社会的冲击。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 环境治理作为“治理”(governance)的一种模式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都形成了基本的框架, 并不乏成功的应用案例。那么, 这些成功的案例背后的条件是什么? 面对环境治理这样一种复杂甚至彼此矛盾的关系,^[1]这些成功案例又是如何规避问题、正常运行的? 本文将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位于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城市——嘉兴在环境治理中的经验,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的调适措施: 一方面提供更为系统的环境治理框架, 另一方面通过“嘉兴模式”的进一步推广来提升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治理效能。

收稿日期: 2018-01-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ZZ006); 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2017155)

作者简介: 张力伟(1992-), 男, 辽宁营口人,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与中国政治。

网络出版时间: 2018-03-12 11:06 **网络出版地址:**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80312.1030.002.html>

一、环境治理的框架：协同治理

环境治理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是不同主体参与到处理环境污染, 保护生态环境以及解决环境纠纷的过程。这些主体可能是政府, 也可能包含社会组织甚至跨国机构,^[2] 公众对于环境治理的作用也不言而喻。^[3] 传统环境治理下, 政府运用政策工具与管制工具“统领”全局, 社会、市场与公民的角色被整体性地湮没在政府权力之下。与此相对, 随着“新公共管理”的勃兴, “治理理论”一跃成为政治与公共管理的热门词汇。在治理话语中, 环境治理与治理理论走向融合, 并衍生出相应的框架与模式。在具体的框架构建方面, 一种观点形塑了政府与其他主体相对平等基础上的“四位一体”: 政府加强制度建设、市场调节资源分配、畅通公众参与渠道与科学制定环境政策;^[4] 另外一种观点聚焦府际合作, 强调政府间针对环境问题开展合作型治理——这主要针对京津冀地区而言。^[5] 无论如何, 这些研究都指向了一个关于协同治理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的环境治理框架。所谓协同治理, 指的是协同合作型的社会治理模式, 不同主体针对特定的议题展开合作、发挥功能, 以实现治理效果的最优化。协同治理背后的动因一方面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控制-依附”关系的解体; 另一方面是后工业社会公共性扩散及其回应的必然结果。^[6] 在此基础上, 不难总结这一环境治理框架产生的原因: 1)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嬗变使得传统政府主导型的环境治理模式急需修正, 需要调动起不同主体的作用; 2) 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选择性忽视”与民众呼唤的“环境公民权”之间的矛盾成为环境冲突的动因之一, 环境冲突对环境协同治理发挥着倒逼作用; 3) 环境治理的复杂性与专业性决定了政府自身不可能处理好这一问题, 必须要整合不同力量。

由此可见, 环境协同治理给我们呈现了较为清晰的理论脉络与建构逻辑, 但是结合上文的分析与现实状况, 这一框架则被广泛应用于化解以“邻避”(NIMBY) 为代表的环境纠纷与环境冲突。这意味着, 该协同框架的应用更多针对环境议题的“风险治理”, 那么环境风险治理的核心要义或许更加关注解决环境风险对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期权威治理体制下的社会治理与法治秩序带来严重挑战。^[7] 倘若如此, 环境治理协同框架便同初始目的产生距离。无论是影响世界的美国“拱心石 XL”事件的处理, 还是中国此起彼伏的“PX 冲突”的化解, 必须承认这一框架有缓和社会运动、安抚抗争形态与疏解社会紧张的功用。但是, 鲜有案例表明这一框架在整个政治系统中体系、过程与政策中的铺展。如此既阻碍了环境治理协同框架在议程设置中的制度化推进, 又会削弱其内蕴的价值意义。就当下而言, 击破环境治理的困局或许已经不在于消解以公民对日常环境保护的冷漠态度为表现的“吉登斯悖论”与“邻避效应”背后的闭环式决策带来的冲突,^[8] 而是让环境治理的新模式从化解风险走向议程设置, 体现出环境治理的整体意义。

不过, 这方面亦非无迹可循。位于长三角地区的重要城市——嘉兴, 在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规导下, 进行了环境治理模式的创新, 从结构、观念与行动三个维度塑造了环境治理的协同框架。2016 年, 国家环保部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布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中国生态文明的战略与行动》研究报告将“嘉兴模式”视为成功经验加以推介。^{[9]16-18} 那么, 本文将以“嘉兴模式”为研究案例, 梳理“嘉兴模式”的总体架构, 从“结构-观念-行动”的社会学与新制度主义分析方法考察其贡献。与此同时, 文章也将分析这一模式所面临的局限, 并试图阐述破解局限的方法, 以期“嘉兴模式”得到进一步推广。

二、案例描述: “嘉兴模式”

嘉兴位于浙江省东北部, 毗邻上海和江苏, 是长三角平原腹地中的重要城市, 不仅是历史悠久的风景文化名城, 也是中国重要的革命纪念地。2011 年始, 嘉兴市开始积极推进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 将环境公民权与环境参与相结合, 并经过制度化的运作流程, 形成了具有广泛影响和借鉴意义的“嘉兴模式”。

2010 年, 嘉兴市成立了环保联合会 (以下简称“环联”), 据环联章程, 这是由“嘉兴各界热心环境保护事业的人士、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区域性的社会组织”。^① 这个由环保人士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 在成立伊

^① 参见嘉兴市环保联合会官方网站, <http://www.jxhblhh.com/guanyuwomen/lianhehuijianjie/>, 访问日期: 2017-04-08。

始就发挥了重要作用。环联下辖的市民环保检查团与环保专家服务团在严密科学的论证下，从嘉兴市的环境承载力、地理环境等专业视角建议市政府否决一个投资额高达百亿元的橡胶项目，最终获得成功。以此为开端，嘉兴市意识到公民参与环境保护的价值与意义，开始着手构建一个多主体协同合作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机制。不到 10 年时间，嘉兴发展出了被学者概括为“社会复合主体与环境公共治理”的基本模式，^[10]并得到其他地区的效仿。

在环境协同治理表现方面，“嘉兴模式”呈现出不同主体合作、多元化行动与共同参与的特征，并且将持续性贯穿始终。此意即环境治理的协同参与不是针对特定问题的反应，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制度化的整体治理流程，涵盖于政策议程设置、环境污染监控、环保知识普及、日常环境问题处理与环境问责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的运作机制。不同主体的角色作用如表 1 所示。

表 1 “嘉兴模式”中各主体的角色作用

主体	角色作用
政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优化环境治理体系，整合不同主体参与 △与政府不同部门和社会组织针对环境议题展开协同合作，搭建跨领域的互动关系 △建立污染企业黑名单
公众 (包括社会组织与个人)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环境保护宣传，向公众宣传普及基本环保知识，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日常环境保护工作 △以“环境陪审员”的身份参与决策论证，监督决策流程，为政府决策提供专家智力支持 △对环境污染进行评估、监测与监督，检查环境信用不良企业的整改情况△针对政府与问题企业进行环境问责
企业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参与环境决策，合理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同政府与公众展开协商 △积极履行环境责任，对于问题进行回应与整改

在嘉兴，“大环保”是“嘉兴模式”的另一种概括，这种形容表示环保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务，是一项公共事务，对环境的治理也不应该仅仅是政府自己的事，而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在“大环保”的牵引下，嘉兴发展出许多具有特色、富有创新内涵的参与机制，如“圆桌会”“陪审员”“点单式”“道歉书”“联动化”等等，具体的机制运作流程与目的如表 2 所示。

表 2 “嘉兴模式”中的参与机制

机制名称	机制流程与目的
圆桌会	政府以圆桌会议的形式邀请利益相关方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与协商讨论，就环境项目的污染控制、环境宣教和环境政策制定形成共识
陪审员	通过选拔“公众代表”（包含专家和律师），根据他们自身能力对环境项目、环境行政处罚案例与环境政策进行评估、论证，为最终决策提供基础
点单式	公众代表抽查企业的环境保护措施与污染物排放等情况，根据检查出的问题同企业进行面对面质询和讨论，提出整改意见
道歉书	如果污染企业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那么企业将会降低其环境信用评分，并需要在报纸上针对污染向社会公开致歉
联动化	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和公众建立协同合作机制，对环境问题进行多方监督，共同讨论治理手段与对策

不同主体根据自身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和位置构成了一个相对合理与完善的治理网络，改变了传统的政府主导的环境监管体制，兼顾了环境治理应秉持的系统性、开放性与专业性原则。就“嘉兴模式”所产生的效果来看，不同主体在彼此合作的伙伴关系中，分享承担了环境治理的不同任务，各自发挥了自身能力。那么，这样的环境治理协同框架的创新之处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它们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本文将借鉴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以“结构-观念-行动”为分析框架，阐释“嘉兴模式”在推进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贡献。

三、结构-观念-行动中的“嘉兴模式”

理论与现实共同说明“嘉兴模式”的形成是多元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环境治理创新模式下，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一方面在于参与的动力系统、运作系统及强化系统；^[11]另一方面专注分析内在的赋权机制，^[12]以试图对“嘉兴模式”提供相对全面的阐释，寻求“威权主义”下环境治理创新的可行路径。但问题在于，环境治理作为一个系统而言不仅牵涉众多的关系，而且具有多元的目标导向。也就是说，环境治理作为一项制度，其变迁的过程也遵从了制度变迁的“多重制度逻辑”。首先，某一制度逻辑的作用是在与其他制度逻辑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其次，需要解读为什么这些行为者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行为方式，以及这些行为之间是如何互动的，才能对制度变迁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最后，他们之间相互作用状况影响了制度变迁的结果。^[13]

将周雪光的研究与社会学研究范式及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进行整合，以嘉兴为典型的环境协同治理模式的解读绕不开多层次分析的基本思路，按照蒂利（Charles Tilly）的逻辑，这正体现了结构、情境与群体网络关系走向统一的过程。^[14]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嘉兴模式”根植于何种特定的结构与情境，不同主体间又是如何行动，怎样构成互动网络？由此，在“嘉兴模式”建构的过程中，不能忽视结构、观念与行动所产生的作用。

（一）结构：外部压力与权力开放

“嘉兴模式”的产生嵌入在外部压力与权力开放共同构成的结构当中，类似的结构也成为环境治理新机制萌生的土壤。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被称之为环境机制的改变社会生活与政治过程的外部影响往往是制度与社会变迁的主要分析单元，^[14]但也不能忽视内部结构变化的作用机制。换言之，政治系统嵌入的外部环境与政治系统本身的共同作用是环境治理新机制产生的基础。

首先，从环境机制角度看，经济生产活动造成的客观环境问题与由此引发的公众环境需求成为促进环境治理模式变迁的外部压力。从此角度，环境治理模式的变迁也体现了“危机生成”与“社会需求”的制度变迁逻辑。^[15]嘉兴与其他城市一样面对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了以2001年沉船封航事件（又被当地民众称为“零点行动”）为代表的激烈群体性事件。除了嘉兴本地之外，江苏与浙江其他地区的类似事件也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可以说，环境破坏已然成为限制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这也成为了“嘉兴模式”产生的外部环境因素。另以太湖污染与江苏启东事件为例，这些环境污染问题引发的生态与社会危机都成为环境治理模式调整的压力机制。目前，针对环境治理的研究也证明，环境治理模式的调整同社会需求显著相关，外部压力构成了环境治理模式变迁嵌入的结构。

其次，外部压力促使权力结构调整，为环境治理模式的变迁提供了政治基础。系统处于环境之中并易受到外部的影响，而系统为了持续下去，必须采取措施做出反应。^[16]3° 政治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反应转变为对“输入-输出”模式的调整：外在压力下，政府为了更好地发挥环境治理的效能，必然要对治理体系进行调整，引入多方参与，扩大政府“输入”的渠道以增强政府“输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在中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下，环境协同治理模式的形成必然以政府开放权力为主导，是政府向社会与公众赋权的过程——这一点已经成为研究者的共识。“嘉兴模式”中政府-公众-企业共同参与的“大环保”机制就是政府开放权力，向社会与公众赋权的体现。总的来说，从传统的封闭型、动员型权力结构走向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制度化机制正成为中国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脉络。

（二）观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观念可以被理解为认知模式，同目标一样，观念是引导行动者如何行动的重要因素。新制度主义研究认为，观念与制度在某种给定的情境下会形成联系，一方的缺失也将导致另一方阙如，总之，不能离开观念理解制度。^[17]从这个意义上，观念的选择与转换也成为影响制度调整与变迁的重要因素。对于环境治理来说，观念要素至少从两个方面产生作用。

首先，政府观念的转变是环境治理模式转变的前提之一。从结构中心的视角分析，环境问题的产生同官员激励模型与“政治锦标赛”体制紧密相关：对经济指标的过度重视使得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这一职能采取选择性忽视的态度，“经济至上”成为政府秉持的观念。但是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对经济增长本身与社会问题的消极影响，使得“经济至上”的观念产生动摇，取而代之的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勃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与以“绿色”为基本内容的五大发展理念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出发重构政府施政的观念。在新观念的影响下，对以传统观念作为支撑的治理结构必然进行自身的批判与重塑。所以，政府观念的转变是“嘉兴模式”产生发展的又一基础。

其次，多元主体共享的观念降低了彼此协同的成本，提高了治理效能。制度作为不同主体互动实践的产物，具有观念性特征。这表现在观念对不同主体的行为产生激励、导向与制约作用。由于政府树立起“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与公众对环境保护的需求和意愿相契合，它消解认知偏差，理顺协同机制，打破了制度惰性，激励了不同主体之间朝向共同观念的协同，降低了彼此合作的成本。在嘉兴，公众自发形成了市民环保检查团、环保专家服务团、生态文明宣讲团和环境维权中心等各类环保组织。这些民间环保力量以志愿的形式将环保理念传播至每一个角落，体现了公众对环境保护的强烈意愿。在认知一致的前提下，政府和社会组织基于彼此的信任关系构成了有机统一的治理结构，这不仅避免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歧与冲突，而且强化了政府对社会的动员能力。因此，观念共享改变了不同主体的行动方式，认知一致下的行动一致构成了彼此间的良性互动。

（三）行动：行动者互动中的治理网络及其强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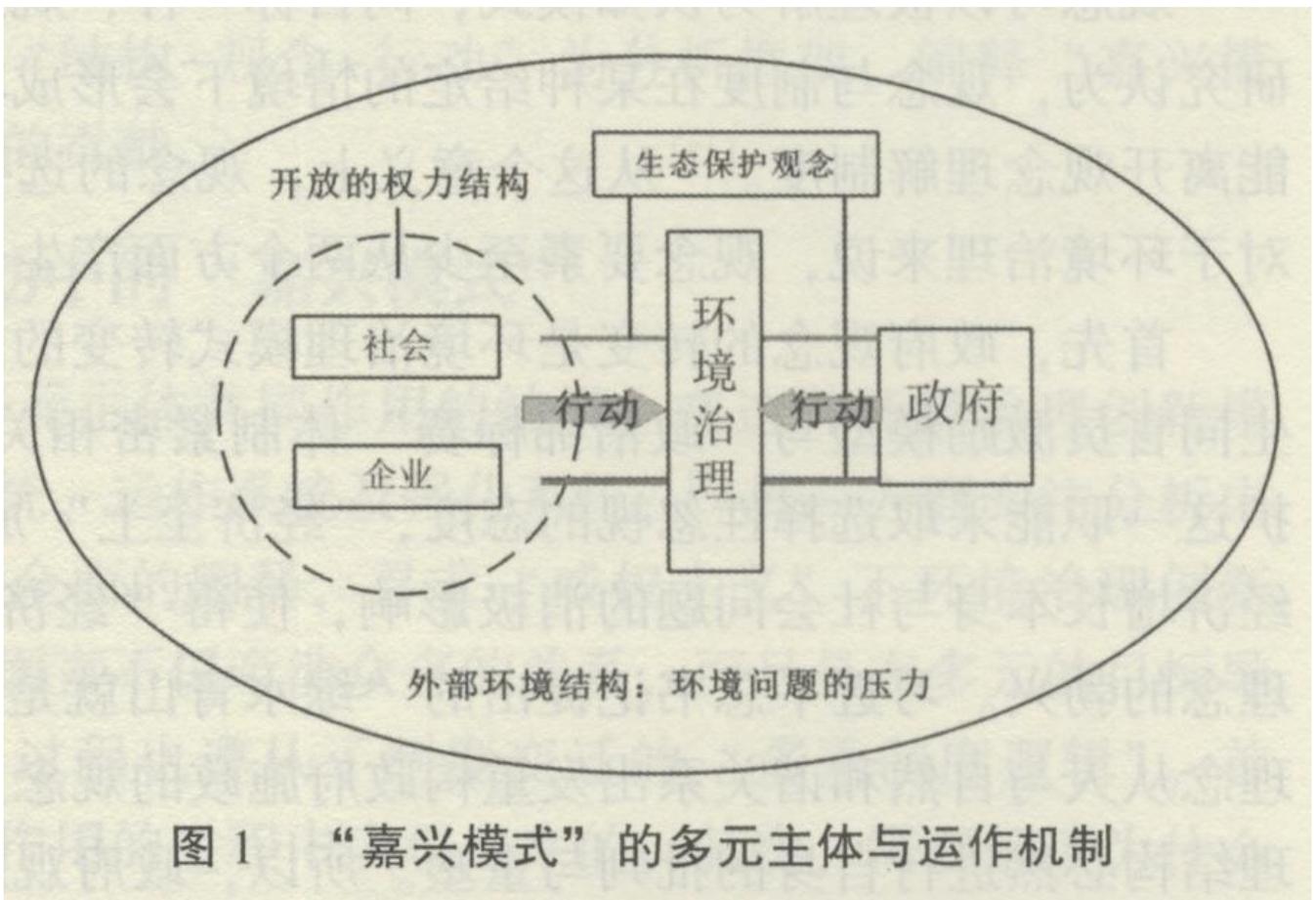
根据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 的行动理论，一项行动应该包含行动者、行动目的与行动“处境”抑或“条件”以及行动的“规范性”取向四个方面。^{[18]49-50} 环境治理中，不同主体作为“行动者”存在，而共享观念构成了彼此行动的目的，嵌人的结构构成了行动的处境，制度化的运作机制形塑了行动的“规范性”。在这几个要素的共同运作下，一个环境治理之网进而形成。在网络中，不同行动者得以充分行动来推进环境治理。在“嘉兴模式”的经验中，有两个行动要素对这一治理网络起到了强化作用，因而值得加以分析。

第一，发动“能人”力量培植社会资本，强化环境治理网络。“能人”是依靠社会资本实现治理的重要工具，体现了“关系治理”的模式。由于“能人”具有较高的声望与较强的社会关系，因而能够在行动中强化以互惠、信任、沟通为特征的社会资本，进而可以强化已有的行动网络。为了推进公众参与的广度与深度，嘉兴市政府于2011年推行了“十百千万”计划：各地都要发现并培养10名左右有热心参与环保公益的、有一定号召力和组织活动能力的、能在公众中起引领作用的公众环保骨干；培养100名左右能经常参与一些环保公益活动的积极分子；培养1000名以上愿意关心并力所能及地参与一些公益活动的环保志愿者。^①通过“能人”的号召力可以形成“以点带面”的影响，动员更多的人参与到环境治理当中，提高了公众参与的意愿，使环境治理网络得以强化。

第二，以中立客观的态度实施环境项目仲裁，提高了不同主体对这一网络的认同。研究者对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担忧是，公众可能在环境污染与自身健康相联系的问题中产生非理性的情绪，反对一切影响环境的项目上马。^[20]这种态度往往会产生“好心办坏事”的结果，即阻碍了环境影响正常且有利于经济的项目。这一点在“嘉兴模式”中得到了规避。嘉兴的一家企业由于

一些原因被政府认为是污染企业，并被列入环境污染企业黑名单。该企业寻求环保组织帮助，希望得到客观的裁决。经过环保组织的科学论证，证明该企业的确“蒙冤”，最终帮助企业摘掉了污染的帽子。^①这样客观的机制不仅为治理网络注入了理性的内涵，是对公众参与效果的认同，而且提升了这一治理网络的作用。

本文借助社会学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整合结构-观念-行动三个维度来分析“嘉兴模式”，兼顾了宏观结构与微观行动的角度，呈现了相对完整的“嘉兴模式”运作逻辑（如图 1）“嘉兴模式”产生如此效能的核心原因在于结构、观念与行动各要素之间的有机配合，构建了政府主导的环境协同治理模式，是治理现代化与政府创新的现实表征。“嘉兴模式”的优势不仅在于从结构角度优化了环境治理体系，还从观念与行动的角度打破了环境治理的内在张力，进而提升了环境治理能力。但通过对这一模式的深度挖掘，也能够从客观条件、结构层次等方面发现问题，这也是推广以“嘉兴模式”为代表的环境协同治理模式时所需考虑的要素。



① 参见嘉兴新闻网：《我市将着力实施“十百千万”计划坚持不懈推进公众参与环保》，http://www.cnjxol.com/Industry/c:ontent/2011-07/27/content_1744169.htm，访问日期：2017-04-09。

② 参见凤凰网：“嘉兴模式”入联合国报告：不让公众参与环保走过场，<http://www.ifeng.com/a/20160606/4621344o.shtml>。

四、“嘉兴模式”的完善：建立更系统的环境治理体系

“嘉兴模式”的成熟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少城市纷纷效仿其环境协同治理的框架。环境治理是系统工程，牵涉不同层级与不同区域，因此“嘉兴模式”应在自身的基础上立足更为广阔的区域，建立更系统的环境治理体系，形成“以点带面”与“上下联动”的合力，进一步推动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形成区域联动，探索长三角地区的环境协同治理机制

嘉兴地处长三角地区，毗邻江苏、上海，临海近湖，生态系统与地理环境比较复杂。一个城市以及特定区域的环境污染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很容易波及其他区域。所以，在效仿“嘉兴模式”的基础上周边城市应该形成区域联动，建立浙江、江苏与上海的区域间的环境治理合作，以跨区域的环境协同治理推进环境治理现代化。探索长三角地区的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区域之间达成环境治理共识，借鉴京津冀的府际合作型治理，建立府际沟通机制，就环境问题开展协同合作。

首先，地理环境因素是建立地区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客观要求。受到人口流动、交通运输以及工业设施布局的影响，生态环境依然受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冲击。由于长三角地区水资源丰富，江、河、湖跨行政区域分布的地理环境致使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污染呈跨界特点。以太湖污染为例，整治太湖牵涉苏浙两省的嘉兴、无锡、苏州与湖州等不同城市，尤其受东南季风的影响，无锡成为受太湖污染影响最严重的城市。如此就决定了城市的环境治理不能“各扫门前雪”，而是应打破环境治理的行政分割体制，建立跨区域的协同机制，共同化解区域环境问题。

其次，区域间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既要关注区域间政府联动，也要强调区域间政府不同部门间的合作。环境问题不仅涉及环保部门，还会涉及农业、水利、林业等多个部门，因此部门之间的联动也是处理好环境这一复杂问题的客观要求。具体而言，各区域各部门联合建立环境预警机制、环境治理协商机制、环境风险管理机制与环境污染问责机制，构成一个整体的协同机制。各区域建立预警机制传递信息，以带动不同城市未雨绸缪；通过协商机制整合力量资源，共同商议治理对策，形成共识；通过风险管理机制提高对突发问题的协同处理能力，减少跨界沟通时间成本带来的损失；以污染问责机制来寻找污染源头，以利于划分责任，令责任主体承担主要治理成本，防止不同区域之间互相推诿。

（二）形成上下互动，充分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中国国家治理不能回避中央与地方所构成的层级关系，对于环境保护而言，提升环境治理能力，也需要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21]将自上而下的政策传导与督察巡视同地方环境治理模式相结合，从理顺“条块”来发挥环境治理整体的效能。对于此，也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

第一，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保证环境保护的政策压力层层传导，根据不同层级落实环境责任。中央政府通过对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的统一规划与整体安排，从全局出发考量问题，有利于为环境工作提供政策指导与价值规训，防止地方各自为政，出于地方利益考虑而“灵活地”将环境保护职能忽略。通过层层落实环境责任，有利于不同层级政府划分权责，明确行动范围。另一方面，通过中央巡视制度强化地方履行责任，做到有错必查、有责必问，形成地方环境治理的倒逼机制。

第二，实现中央政策的统一性与地方执行灵活性的统一，破解央地之间的治理矛盾。环境问题具有明显的地方性与社会性特征，因此对于环境问题，要充分尊重地方的特殊性，允许地方根据区域的地理、人文等特征安排环境治理的方式与内容。央地之间往往会造成统一与灵活之间的矛盾，而地方政府的有效治理的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诉诸地方性、社会性、非正式性的种种话语和做法。以此观之，在中央统一安排之下对地方合理赋权，才有利于理顺体制，形成治理合力，提高治理能力。

归根结底，建立更加完善的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于保证政府与社会等多元主体保持互动的基础上发展跨区域联动与中央地方之间的互动，在中央、地方与社会之间构建一个多维的治理之网。以“嘉兴模式”为例，在中央对环境问题进行统一部署之下，地方结合自身优势，探索环境治理的创新机制，并以此为基础，拓展同江苏、上海等地的跨区域协同机制，是“嘉兴模式”进一步发展的可能路径。

五、结语

环境治理牵涉的不仅仅是环境与生态保护，而是政治、社会、生态等多个系统构成的复杂互动关系。“嘉兴模式”从结构、观念和行动三方面塑造了环境协同治理机制，为环境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概括而言，这种机制依靠政府开放权力，搭建多元主体参与平台、完善社会组织结构，塑造社会组织与公众的有机配合以及多元主体共享环境保护观念，形成环境保护合力共同塑造，不仅超越了传统的治理模式，也为破解现有的环境治理困局提供了思路。

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是找到政府与社会的环保公约数，实现中央和地方的良性互动，就是找到了各级政府的治理平衡点。^[21]“嘉兴模式”在寻找公约数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中央对于“嘉兴模式”的重视也体现了中国探索中央与地方共同打造环境治理新模式与新机制的努力。但是我们在讨论“嘉兴模式”的时候不能够回避嘉兴优渥的经济背景与相对特殊的地理环境，这些背景为嘉兴在推动环境治理、促进区域协同治理等方面的创新提供了相对优越的条件。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先行、环保滞后依然是一些地方政府秉承的上策。因此，“嘉兴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适用性还需要细致科学的分析与讨论，从这里提炼出的问题是，如何立足区域特征、因地制宜地发展出创新的环境治理体系与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寻找经济与生态之间的平衡，而这或许将成为环境治理问题的研究重点。

参考文献：

- [1] 余敏江. 论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制度基础——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分析视角[J]. 理论探讨, 2013(2):13-17.
- [2] WANXIN LI.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sues and Challenges[J]. Environmental Law Reporter, 2016, 36(7): 10505-10525,
- [3] 任丙强. 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的环境治理：问题、挑战与对策[J]. 政治学研究, 2013(5):64-70.
- [4] 唐任伍, 李澄. 元治理视阈下中国环境治理的策略选择[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4(2):18-22.
- [5] 高建, 白天成. 京津冀环境治理政府协同合作研究[J].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15(2):69-73.
- [6] 张振波. 论协同治理的生成逻辑与建构路径[J]. 中国行政管理, 2015(1):58-61, 110.
- [7] 杜健勋. 邻避运动中的法权配置与风险治理研究[J]. 法制与社会发展, 2014(4):107-120,
- [8] 杨志军. 环境治理的困局与生态型政府的构建[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103-107.
- [9] UNEP. Green is Gold: The Strategy and Actions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16.
- [10] 朱狄敏. 社会复合主体与环境公共治理的走向——嘉兴模式的经验启示[J]. 环境保护, 2014(13):58-60.

-
- [11] 辛方坤, 孙荣. 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授权合作的“嘉兴模式”研究[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6(4):72-80.
- [12] 林卡, 易龙飞. 参与赋权: 环境治理的地方创新[J]. 探索与争鸣, 2014(11):43-47.
- [13] 周雪光, 艾云. 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 一个分析框架[J]. 中国社会科学, 2010(4):132-150, 223.
- [14] 查尔斯·蒂利. 为什么? [M]. 李钧鹏, 译.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 [15] JOSEPH FEWSMITH. The Logic and Limits of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1-18.
- [16] 戴维·伊斯顿. 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M]. 王浦劬,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7] JAMES T. Kloppenberg. Institutionalism , Rational Choic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J]. Polity, 1995, 28(1): 125-128.
- [18] 塔尔科特·帕森斯. 社会行动的结构[M]. 张明德, 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
- [19] 万俊毅. 准纵向一体化、关系治理与合约履行——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温氏模式为例[J]. 管理世界, 2008(12):93-102.
- [20] 何艳玲. “中国式”邻避冲突: 基于事件的分析[J]. 开放时代, 2009(12):102-114,
- [21] 盛玉雷. 提升环境治理能力, 要有“两个互动” [N]. 人民日报, 2017-04-26(5).